

朝鮮族哲學思想史論集

佟德富 金京振 编

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

思想研究	金京振(1)
萨满教与朝鲜族神话传说	张春植(6)
反映于巫歌的朝鲜族神话遗产	姜莲淑(14)
论朝鲜族炕柜饰件与	
宗教信仰	佟德富 金京振(26)
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	张立文(34)
论退溪对程朱理学的理论贡献	李洪淳(53)
栗谷的实学思想	崔龙水(71)
论李珥的诚哲学及当代反思	金京振(82)
朝鲜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 徐敬德	鲁学海(95)
试论申采浩的哲学及社会政治思想	朱七星(107)
崔汉琦认识论初析	林贤九 鲁学海(114)
金泽荣哲学思想初探	金东勋(127)
全琫准思想探讨	王 健(138)
朝鲜族的天道教及其哲学观	朴昌昱(153)
朝鲜族天道教评述	金京振(169)
试论元晓佛教哲学思想——“一心说”	朱红星(178)
浅谈朝鲜族神话悲剧的美学价值	树 枫(188)
阳刚与柔韧	
—— 蒙古族与朝鲜族审美比较	刘一沾(196)

虎：朝鲜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积淀 ——兼及朝鲜民族民间传说故事中虎的	
社会意义	韩今玉(212)
论朝鲜族传统心理与改革开放	佟德富 金京振(226)
朝鲜族先民孝道浅析	佟德富 金京振(237)

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

金京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或比较悠久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歷史都作过贡献。中国的朝鲜族是一个跨界民族，从原始共同体社会一直到19世纪前半期，与朝鲜国经历了共同的历史阶段。在这共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朝鲜族人民和朝鲜国人民一起，共同创造并发展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我国朝鲜族人民在自己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创造了以反映中国现实和自己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民族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家都知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哲学这个定义不仅指明了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区别，也指明了它同世界观的关系。任何人都可能对世界的一般性问题、普遍性问题有一定的看法和观点，或者说具有某种世界观，但这并不等于人人都掌握了某种哲学。普通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往往是自发的、朴素的、零散的，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哲学则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能够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民族起码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这个民族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

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每一个民族，不论人数多少，发展程度高低，只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活动中，肯定会产生对自然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对这两方面的知识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这个民族的某种哲学思想。当然，各个民族哲学思想系统化的程度，因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只要对世界一般问题、一般规律有了一定的系统的知识，就不能否认某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存在。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所以，凡是经历过文明历史的各个民族都必然有它相应的哲学及其社会思想，不论它的外在形式是高度“文明的”还是较为“粗野的”。列宁在阐述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内容时也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②这里我们应该补充说，在这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里，就以同样的“必然”性包含着相应的哲学思想作为它的“活的灵魂”。总之，每个民族只要经历了文明时代必然就会产生自己民族的哲学思想。这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朝鲜族人民和朝鲜国人民是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他们曾共同经历过阶级社会，从事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共同创造并发展了民族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朝鲜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的存在。

有的同志认为，朝鲜族没有或很少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因此朝鲜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这种看法只盯住哲学专著，而忽视其它的文献资料的价值。从历史上看，我国汉族在古代专门的哲学著作也不一定很多，但其哲学思想却很丰富。许多哲学思想不一定都反映在哲学专著当中。这

些思想也可以反映在历史、文学等其他书籍或文献当中。如《论语》不是哲学专著，而是关于孔子言论的汇编，但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哲理。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朝鲜族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虽然至今在国内所发现的专门哲学著作还没有，但其哲学思想的存在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上在朝鲜族的历史、文学、民俗、谚语、传说等中包含着不少朴素的哲学思想，有些思想还是相当深刻的，如在《申采浩全集》中，关于社会进化论和“人权平等”思想以及有关辩证思想还是比较精彩的。

有的同志认为，朝鲜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是汉族的思想。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当然，汉族的思想对整个朝鲜民族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朝鲜民族一旦接受了汉族思想的影响，就会把这个影响同自己思想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变成自己思想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否则这种影响就不会继续下去。如朝鲜民族接受汉族儒家思想就是在整体上用自己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把汉族儒家思想改造成为基本适应本民族的儒教，使它变成基本适应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各民族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是各民族相互交往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没有理由把这种相互影响只看作单方面的。

有的同志认为，朝鲜族迁入中国的历史较短，因而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这种看法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细想起来也有问题，因为这种看法否认了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好，思想也罢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迁入民族尽管仅有几百年的历史，但至少在某些方面同朝鲜国民族有着文化的、思想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可能因迁入而消失或泯灭。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推断“历史较短”而否定整个朝鲜族的传统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存在。

目前，在我国搜集、整理和研究朝鲜族历史、文学、民俗、语言、

谚语、诗歌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正在深入进行并已初见成效。但对朝鲜族哲学(包括朝鲜族伦理、宗教、教育、民族心理等等)思想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没有深入展开。

为了积极地开展我国朝鲜族哲学和其他社会思想研究工作，我认为：

第一，应注意朝鲜族哲学和朝鲜国哲学思想的有机联系。朝鲜族是跨国民族，同朝鲜国人民一起共同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朝鲜族的哲学思想以及社会思想同朝鲜国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状况就决定研究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要注意考虑两方面的联系：一是同朝鲜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哲学及社会思想的联系，一是朝鲜族迁入以后同汉族文化的联系。

第二，注意发掘流传在朝鲜族民间中的社会思想。研究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除了研究有关专人专著外，还要集中精力由散见于民间的故事、格言、谚语等文学作品中加以发掘并进行概括。列宁在评论一部民间口头创作集时说：“我们的学者，就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才是人民的创作，可是他们忽视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它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不久前我翻阅了一下考鲁包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目录，以及他的俄国哲学图书目录。那里应有尽有！……可是富有人民哲学思想的作品书目却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比起我们许许多多的……哲学家的所谓胡说八道，要有趣得多。难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的论文吗？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④这里，列宁把“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哲学小册子”和“富有人民哲学思想的作品”，把“许许多多的……所谓哲学的……”“胡说八道”和“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世界观”明确地对立起来，进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的论文”。可见，重视

“人民的创作”并从中挖掘出有益于社会的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项任务。流传在民间的作品、故事、谚语、格言等是研究朝鲜族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因为相对地说，这些民间创作一般都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没有受到文人学士的加工，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思维和社会思想的本来面目，因而有助于考察该民族的认识发展和哲学宇宙观的萌芽。

第三，研究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从朝鲜族的历史事实和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在广泛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总之，研究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难度大，困难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以说对它的研究还是个空白。为了搜集、整理、研究我国朝鲜族哲学思想，集中一些人力，建立一些必要的研究协商机构，并制定一个统一的、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也是必要的。

我认为，重视和加强对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的研究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培养和提高朝鲜族的理论思维能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原载《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②《列宁全集》第20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③《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页。

萨满教与朝鲜族神话传说

张春植

朝鲜族是否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是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令人信服的观点。但朝鲜族具有许多与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相近或相同的特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萨满教的存在和萨满教文化的影响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例。

每个民族都存在两种文化，即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朝鲜族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文化我们可举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历代统治阶级一向乐意追随汉族文化，佛教文化也只不过是从中国引进的印度文化而已。至于被统治阶级文化，即民俗文化，我们可举出很多种类，但是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我认为还是萨满教文化。

朝鲜族萨满教文化的历史演变

朝鲜族萨满教的名称与其他一些民族有所不同，如称萨满教为“巫俗”，称萨满为“巫堂”，称跳神或由萨满主持的一些祭仪为“固斯”（音译名），举行这些仪式便称“行固斯”或称“做固斯”等等。有人甚至因此怀疑朝鲜族的“巫俗”不是萨满教，而可能是巫教的一种，但从其历史演变过程和宗教本身的存在状态分析，朝鲜族的巫俗无疑是东北亚大陆萨满教的一种。

萨满教在朝鲜族中产生的具体年代已很难考证，通常以古新

罗国(公元前 57—公元 935 年)的金冠为最早的实物根据(有人认为这顶金冠的祖型就是西伯利亚萨满教中萨满主持宗教仪式时所用的法具之一的冠)。朝鲜古文献《三国遗事》(13 世纪僧一然著)中有关新罗国第二代王南解次次雄名字中的“次次雄”与“巫堂”、“尊长者”相互意通的解释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又据公元 2 世纪至 9 世纪的中国编年史中记载,东北一带所居东夷族当中扶余、高句丽、东沃沮、勿吉等皆为萨满教徒,而其中的扶余、高句丽均为朝鲜族的祖先。另外,据朝鲜古文献《三国史记》(12 世纪金富轼著)的记载,高句丽国的辽东城(即今中国辽宁东部)屡遭隋炀帝、唐太宗等中国历代皇帝亲征军的侵略,但始终未被征服。于是解释说,这是因为城内有始祖神高朱蒙的神庙,并由巫女祭祀求助的缘故。这显然是一种迷信的思维方式所致。但是我们却从中可窥见萨满教信仰对当时城内将士们的精神作用。

时至高丽朝(公元 918—1392 年),朝鲜族萨满教虽遭到儒学者们的排斥(他们把萨满视为惑世诬民之徒而驱逐城外),却因与当时的国教佛教并无本质上的冲突而得以继续存在发展,并且曾经出现过叫“仙宫”的贵族出身的女萨满。朝鲜族的萨满教真正走下坡路始于李朝(公元 1392—1910 年)初期。因李朝封建政府痛恨佛教,强力推行崇儒排佛政策,把国教由原来的佛教改为儒教,从而使除儒教外的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受到深重的打击,甚至把巫堂(即萨满)同僧侣、艺人、妓女、工匠、屠夫、丧舆扛夫、奴婢一并归入“八贱”而使之受到歧视和排斥。另外,当时封建政府所极力推崇的儒家、道家、诸子百家思想,尤其是以阴阳五行说为代表的所谓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更从根本上动摇了萨满教等民间的信仰观念(对社会的发展,唯物主义的兴起可能是一大进步。可是对萨满教却是一种灾难)。接着就是 18、19 世纪开始流入朝鲜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还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军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和 20 世纪初开化思想(以近似西方文明思潮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思

想)对宗教和迷信的全面否定。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方面把西方的近代文明带入朝鲜,用现代哲学思想和科学文明否认萨满教信仰,而另一方面则又出于控制朝鲜民众意识的目的,在民间推行愚民政策,放任甚至扶持萨满教,控制反日思想情绪的增长和蔓延。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其结果不仅为其侵略和掠夺铺平道路,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为朝鲜族萨满教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一条活路。

总而言之,朝鲜族的萨满教虽屡遭灾难,却奇迹般地存续至今。如朝鲜西海南部一带的一些岛屿上还保留着叫“选举吏”(音译)的50—60岁的女萨满;又如朝鲜东海岸的江原道的一些山村还存在着叫“卜者”的50—60岁的男萨满。他们不仅占卜预言、跳神治病除灾,而且还为村民主持正月的安宅祭(一种祈求家庭平安的祭仪)和“洞祭”(一种祈求村内平安、村民团结的祭仪)等各种宗教活动。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朝鲜最大的岛济州岛是如今朝鲜族萨满教保留得最完整的一个地区。在这里,现在还能看到许多萨满教神堂和职业萨满,并且这些神堂都有叫“堂神本解”的自己所侍奉的神的由来故事(有的堂神本解还叙述始神萨满的由来故事),如果我们把这些故事母体与朝鲜建国神话中类似的故事母体相对照,也不难看出现存的萨满教残余同扶余、高句丽时期东北亚大陆萨满教的连续性。作为萨满教信仰的残余,在朝鲜族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方式是不甚规范的、简单的家族内部信仰风俗。如厨房侍奉火神“灶王”,祈求家内平安无事;里屋侍奉产神或祖灵,祈求丰农和子女健康成长;廊下侍奉“成主”神祈求家内平安;屋后侍奉“业神”祈求发财致富等等。另外还侍奉麻疹神“胡鬼”、天花神“别相”、防除牛鬼蛇神的“神将”、氏族神“军雄”、除厄神“水田夫”、财运守护神“山神”、寿命神“七星”、死灵供养神“巴里公主”、死神“十王”或“使者”等等。尽管对上述诸神侍奉的方式比较简单(往往是逢年过节或者遇到意外灾难时准备点儿简单的祭品磕头祈祷),也没有规

范化的程序,但却能说明朝鲜族的萨满教信仰意识还存在,并由此产生过许多比较规范化的宗教仪式,如“灶王固斯”、“产神帝释固斯”、“成主固斯”、“财数固斯”、“病固斯”、“死灵供养祭”等。

朝鲜族的萨满教与其他阿尔泰语系民族一样除具有上述各种机能外,还具有民间娱乐和产生民间文学和艺术的机能。首先,萨满教的祝词、咒语、神歌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作品形式,仅在朝鲜济州岛现已收集到的各种“堂神本解”就有数千种,有的长达2—3千行。此外,朝鲜族的一些民间艺术形式也出自萨满教。如由萨满家族成员中男性担任唱者的“判梭利”(音译,一种朝鲜族说唱艺术形式,中世纪的朝鲜族国文小说亦从中脱胎产生,《春香传》就是其中一部名作)、假面剧(据考证,朝鲜国宝之一的“河回假面”系朝鲜高丽时期庆尚道河回村农民为在“洞祭”上使用而制作的)和一些谚语(有关“固斯”的朝鲜族谚语至少也有十几条)等都是受萨满教的影响产生和发展的。

朝鲜族萨满教文化的特点

在现代朝鲜族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意识中萨满教文化的影响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对其复杂性我们一时还很难全面分析,在此只能对其最基本的特点加以探讨。首先,这一特点表现为与崇祖观念密切相联的民众意识的聚合力。多数信仰萨满教的民族都有关于萨满产生的各种神奇的传说,如布里亚特蒙古族关于大鹰与女人婚配所生之子成为最初萨满的传说,雅库特人关于食婴魂之鹰所生的大卵中孵化出最初萨满的传说等等。我们从这些传说中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这些民族把萨满的产生与民族的图腾神话联系起来;二是在这些民族的意识当中,萨满与神有直接关系,他们绝非普通之人。前者说明萨满教与民族原始意象的关系之密切,而后者则把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合理化。在朝鲜族的萨

满教中类似的传说比较少见，只在“堂神本乡本解”中偶尔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始祖神的传说。这些始祖神又不局限于第一代王的神奇故事，如有关高句丽第二代琉璃的诞生或扶余国第二代王金蛙王的诞生都有神话故事。在现存的萨满教神话传说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甚至在一般家族的族谱上也可以找得到。人们用这种传奇的神话故事来把自己的祖先神圣化。并以此形成比较牢固的部落或氏族集团乃至一个部族国家。但是这种聚合力只限于部落和特定的小集团，对整个民族的团结并没有直接的作用，相反很可能造成部落或氏族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留下了原始氏族社会部落割据的痕迹。在济州岛这种痕迹更为明显，甚至各个部落神堂所侍奉的神之间也互不相干，人们也只信仰自己神堂的神，不在乎其他神堂的禁忌。那么整个朝鲜民族民众的聚合力来自何处呢？我们已经知道萨满教文化的民众聚合力与崇祖观密切相关，而佛教的主要信仰基础是“忠”与“孝”，因而崇祖观念与忠孝思想相融合便形成巨大的民族聚合力。朝鲜历代封建政府都执著追随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朝鲜族萨满教文化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宗教观念和原始意象即原型的统一性。萨满教是人类幼年时期产生的最原始的宗教，是原始人最初认识世界的方式之外在表现，因而它自然而然地与一个民族通过神话表现的原始意象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实际上现存的朝鲜族神话中多数是在萨满教或其他原始信仰仪式上吟唱过的，就是说朝鲜族神话基本上是“祭典相关物”。这个问题在现存的朝鲜族萨满教神话中可以得到证实。在萨满教各种祭典中意义最大的内容就吟唱有关神或始祖萨满的起源、或由来的故事，“堂神本乡本解”中“本乡”一词本身就含有源泉、起源、出生地等意思。《三国遗事·驾洛国记》所记首露王建国神话中也出现类似的祭典仪式。文中记录，壬寅三月契浴之日在北龟旨常听到呼唤声，众庶二三百人集合于此一看，有人隐其形发其言道：皇天命我来此为

君，尔等须掘峰顶撮土唱“龟何龟何，首其现也……”歌，以之蹈舞则是迎大王。众人如其言“咸(感)忻歌舞”，且出现一金盒，盒中有六金卵。翌日天明开盒，六卵化为童子，童子长大后便成国王，建立大驾洛国。在此记录中众庶集合唱歌跳舞迎大王无疑是一种原始的祭典仪式。在现传的朝鲜南部一些农村的民俗祭仪，如各种“城隍祭”中村落守护神再现后返回神国之程序与之相对应，在东明王传说、温达传、薯童传等传说中也留下明显的印迹。《东国李相国集·东明王篇》(高丽李奎报著)中东明王高朱蒙认分离多年的琉璃为子时，凭据就是其神性(身跃空中与日相接)，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咒术飞翔”模式。而温达传和薯童传等传说因其主人公以低贱身份同公主相爱，立神妙功绩后才被国王认可当驸马的情节与萨满教神性显示模式相对应。此外还有很多事例可以认证朝鲜族神话乃萨满教各种祭典的“口述相关物”这一命题，换句话说朝鲜族神话大多是有关诞生、结婚、入社、就任、死亡等各种萨满教祭仪(包括其他一些原始祭仪)的口述表现。

朝鲜族原始意象的核心是“天空”观念(“天空”分天界与空界，天界指主宰者即自然本性的象征，它趋向下降；空界则指大气空间即通过升华还原的理想彼岸)。它与作为原始人自然崇拜思想之核心的太阳观和光明观相联系成为朝鲜族理想乐园的象征表象。这一意象在古代朝鲜族天降神话中尤为突出。如《檀君神话》中天神之庶子桓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檀树下与熊变女身相婚，其子檀君建立古朝鲜，治国一千五百年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三国遗事》)的故事。在此例中人从天降，而后又升回天这一意象比较突出，至于檀君最后未升回天而却还隐为山神则与萨满教中人死后灵魂暂留观念相对应，自然也可以理解为已升回天，阿斯达是其神的活动场所。赫居世神话也体现类似的意象。《三国遗事》中记载，“……于是乘高南望，杨山下萝井傍异气如电光垂地，有一白马跪拜之状，寻检之，有一紫卵，马见人长嘶上天。剖其卵得童男，形

仪端美。惊异之，浴于东泉，身生光彩……因名赫居世王，位号曰居瑟邯”。赫居世王治国六十年后升天，且七日后其体散落于地。国人欲合葬却见一巨蛇挡路，只好分葬五体称五陵。这一情节又与萨满教的葬礼相对应。在萨满教葬礼中月亮的缺盈原理被神圣化，因此认为人的尸体分散乃再生的前提，故把尸体有意剥碎。在《解慕漱神话》等其他一些神话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意象。这种天、地、人三合一的观念成为朝鲜族集体无意识中最基本的幻象，其他一些意象本质上也属于这一基本意象的派生物或者是另一种表现形态。

所谓原型就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同一个形象（其中包括神、怪人或一个过程等），也就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这些民族的心理上留下来的历史痕迹，而这个形象往往是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时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根据荣格心理学的这一原理审视萨满教与朝鲜族神话原型的关系，那么朝鲜族萨满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未曾被淹没而存续至今的奥妙也就不难理解了，多数现代朝鲜族对萨满教无所信仰却仍然进行各种有关活动或表现有关心态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实际上萨满教和神话都是原始人思维观念的外在表现，只是其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前者从逻辑方式推理出形而上学的理性形态，后者则直接以感性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萨满教的观念跟神话的形象一样在朝鲜族的潜意识当中沉积下来（或以观念形态存续下来）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心态。

朝鲜族萨满教文化的特点在其神歌中也有所体现。

江南天国正字村的姊妹
登上济州岛
一做朝天关正中夫人
一做金宁官金前夫人
天上的公主小公主

抱不起的金书
握不起的金笔
还有三千砚石
负责解产
又负责葬礼
正月十三晨大祭日(新年祭)
七月十三霪雨后的神衣清扫祭
九月十三、十四新万谷大祭
万民丹骨三大祭之神堂
末女正坐花木田
是位猛虎夫人

(《金宁里大堂本乡本解》全文)

据尼翰拉滋的《西伯利亚各民族之萨满教》一书介绍,萨满在神歌中“以美而有力之言语聚请精灵之降临与援助。彼等有时歌唱彼等处灵验及恍惚之状态时,彼等目中所映之幻觉的惊异。有时歌唱各种精灵。”我们在随意选引的例文中也可以看到,它几乎以神话的形式叙述自己神堂的历史,当然其目的与其他民族神歌无所不同,无外乎为感染信徒,把自己(萨满)神圣化。可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朝鲜族的神歌与古代佛教的普及文艺密切相关。在中原,这种形式早在唐代以说唱文学的形式流行,在日本平安时代(公元10—20世纪)以唱导文艺形式风靡一时,而在朝鲜则吸收到萨满教神歌中流传至今,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篇《世民皇帝本解》的叙述与中国敦煌千佛洞中的《唐太宗入冥记》是一样的故事,而《唐太宗入冥记》又与朝鲜李朝时期小说《唐太宗传》酷似,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象出现存的朝鲜族萨满教文化之面貌。

(原载《延边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反映于巫歌的朝鲜族神话遗产

姜莲淑

神话，以谈神述怪为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它讲述的是有关神怪的故事。从其传诵形式看，可分为文献神话、口传神话和巫俗神话。朝鲜族的文献神话，又被收录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文献之中，代表作有《檀君神话》、《解慕澈神话》和《首露王神话》等。朝鲜族的口传神话，主要讲述开天辟地、人的产生、万物的来源和崇尚部落神的原由，代表作有《太阳和月亮》等。朝鲜族的巫俗神话，寓于巫觋哼唱的巫歌之中，是一曲曲讲述巫俗神的特点和来由的颂歌。它，是一份很丰富的神话遗产。但是，迄今仍有不少人一谈及朝鲜族的神话便认为只有见诸文献的那有数的几篇，忽略了反映于巫歌之中的这份神话遗产，似乎朝鲜族的神话遗产少得可怜不值一提。

本文专就反映于叙事巫歌之中的朝鲜神话遗产略抒己见，意在抛砖引玉，引起有志于发掘朝鲜民族神话遗产的有识之士的进一步重视。

一

生活在原始社会和远古的朝鲜民族的祖先，像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以其十分浅薄的知识，无法正确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更不知这些复杂的现象的成因。他们以为自然界的一切变